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

罗 勇 邹春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 俗文化研究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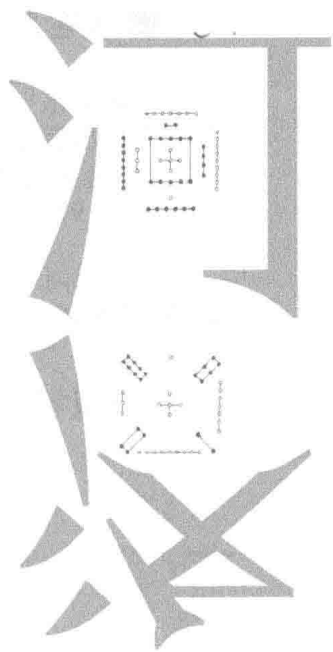
俗文化與教育文化建設

◎ 作者：陳冠中

◎ 2005年

◎ 304頁

◎ 35元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

罗 勇 邹春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述论 / 罗勇, 邹春生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8. 2
(河洛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15 - 11337 - 4

I. ①河… II. ①罗… ②邹… III. ①文化史—研究—
河南 ②客家人—民族文化—研究 IV. ①K296.1 ②K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714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6578806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40 千字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1.00 元

前 言

说到客家人,许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是客家?”的确,这是一个令人颇感好奇的问题。因为在汉民族的几大方言(湘语、吴语、粤语、闽南语、赣语、客家语、西南官话、北方方言)群体中,客家人是唯一不以行政地域为族群称呼的。但是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目前仍在探讨的问题。

综合客家研究的历史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我们对“客家”这一概念大体可以这样概述:

所谓“客家”,通俗地说就是:以赣、闽、粤相交的三角地带为基本住地,并分布到海内外的广大地区,以客家方言为母语的汉族群体。

如果说得完整和学术化一些,则可以这样表述:客家是历史上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中原汉民渐次南下进入闽赣粤三角区,与当地土著和畲瑶等民族长期融合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独特的客家方言系统、独特的文化民俗和情感心态的稳定的汉族支系。

学术界通常用“客家民系”或“客家族群”来指称客家人。

“民系”一词是客家研究的开山祖罗香林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发表的《民族与民族的研究》一文中新造出来“用以解释民族里头种种支派的”。他在 1933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就使用了“客家民系”这一概念,意指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重要支系。后来“客家民系”一词被学术界和文化界广泛使用。

“族群”这一概念源自西方,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中国大陆传播。这一概念强调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群体,其成员的认定重在“自我认同”,具有宽泛和灵活的特点,其内涵可伸可缩,既可以指一个民族,亦可以指一个民族中的次级群体,使用起来很方便,有利于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故在相关学科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客家族群”一词也频频出现于学者的文章和著作中。

由上可知,“客家民系”和“客家族群”虽说法不同,但所指称的都是同一事物,即客家人群体。

历史上,客家人曾不断迁徙,以至广泛分布于海内外。2004年第19次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相关资料显示,全球约有客家人口八千万。国内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广西、海南、湖南、湖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台湾、香港、澳门等15个省、市、特别行政区,其余各省、市、区也都有散居的客家人;国外客家人广泛分布于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东南亚各国最为集中。

二

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是在唐末至明清漫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孕育这一产儿的母体就是赣、闽、粤客家大本营地区。在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条件下,诸多因素对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的形成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择其大端,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首先,唐中后期至宋末的移民运动是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等原因,大量的汉民从江淮、荆湖、两浙乃至中原迁入赣、闽、粤三角区,由此打破了这一区域长期处于原始封闭的状态和古越族的后裔山都木客以及畬瑶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居民格局,给这一区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勃勃生机。一方面,汉民们把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入这一地区,使这一地区得到较快开发,迅速改变着往昔那种“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野兽横行,瘴疠肆虐”的面貌。另一方面,汉民们与畬瑶等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在一起,势必以自己优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他们发生方方面面的影响以致最后同化他们。杨澜《临汀汇考》描述了长汀、宁化等地原来“刀耕火种”的畬瑶等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后的情况,“于是负耒者,皆望九龙山而来。至贞元(785—804)后,风土之

见于诗者有曰：“山乡只有输蕉户，水镇应多养鸭栏，隐然东南一乐土矣”。上述两个方面便促使赣、闽、粤三角区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以至到了宋代，这里人文蔚起，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蕴涵着其他因子的新的文化形态——客家文化便初步形成了。

其次，赣、闽、粤三角地带独特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一方面，客家先民从北方迁到南方，从平原地带入居山区丘陵，他们虽然远离了动乱与战火，却面临新的生存劣境。因此，他们不得不对原来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作某些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由此久之而形成新的风俗习惯，如温仲和在《嘉应州志》中写道：“州俗土瘠民贫，山多地少，男子谋生多抱四方之志，而家事多任之妇人。故乡村妇女，耕田、采樵、绩麻、缝纫、中馈之事，无不为之，絜之于古，盖女工男工皆兼之矣。”这是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男耕女织”很不相同的新的男女分工格局，由此也就铸就了客家妇女吃苦耐劳、精明强干的优良品格和不缠足、不束胸的健劲气习。又如，赣、闽、粤山区不宜种麦子磨面粉，客家人就在豆腐里面塞上肉馅做成酿豆腐，形似饺子，这便是北方人吃饺子习俗的一种承传和变异。另一方面，客家大本营地区四面环山，交通不便，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为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系个性创造了条件。如客家方言中保留着较多唐宋时期的中原古韵和古汉语词汇，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再次，赣、闽、粤三角地区土著居民的文化给客家文化的形成以重大影响。从人类发展的通则来看，不同民族间文化的影响和融合是双向式的。如前所述，南来汉民在进入客家大本营地区后，以自己优势的文化去融合、征服土著居民，那么，土著居民也势必以自己固有的文化去迎接这种外来文化，双方便在这种不断地撞击中激荡和交融，最终孕育出一种新文化，即客家文化。根据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赣、闽、粤三角区的土著居民即是古越族的后裔和畬瑶等少数民族。因此，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古越族和畬瑶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一点是肯定的，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目前学术界较为主流的意见认为，客家民系孕育于唐末五代至两宋时期，至迟在南宋后期，在赣、闽、粤相交的广大山区地域，客家民系已经形成。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客家方言的形成。

南宋后期至元明时期，客家民系不断发展壮大，明中叶，王阳明镇压蓝天凤、

谢志珊为首的畚民起义后,使畚民分散居住,又订立乡规民约,大大加速了畚族的汉化过程,客家民系走向成熟。

至于“客家”名称的出现则可能要比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晚得多。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最早提到“客家”这一名称的是清初屈大均修的《永安县次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其云:“县中多雅秀氓,其高曾祖父多江(西)、闽(福建)、潮(州)、惠(州)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读诵,勤会文。”根据这一记载推算,“客家”称呼至迟在明中期已出现,只是当时没有文献记载而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认识:第一,中原原本没有称之为客家民系的人群;客家民系是发生于赣、闽、粤毗邻区的事物。第二,客家民系形成之前渐次迁入赣、闽、粤客家基本住地的中原(北方)汉民,即“客家先民”,来自中原,来自北方;他们带来了中原的基因,播衍了中原的文化。所以说,客家根在中原,根在河洛。

因此,探讨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弄清客家文化的源头及其发展脉络,是一项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三

本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究”之子课题的最终成果。全书共五章,分别阐述了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客家文化生成的背景及其发展脉络、客家文化的主要内容、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客家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内容。其中有的是已有研究的再现,有的则是新的探索和思考。然而,不管是已有的还是新近的,均不敢言系统、全面,更不敢以“创新”自许,其中的缺漏乃至错误之处肯定不少,惟望专家学者和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作者

2014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河洛文化:客家文化的重要源头	1
第一节 河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2
第二节 河洛文化的发展与中原文化的播衍	15
第三节 河洛文化与客家文化	27
第二章 客家文化生成的背景	41
第一节 客家基本住地的原生态环境	43
第二节 北风南渐与赣、闽、粤边区的初步开发	51
第三节 中原战乱与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	61
第四节 赣、闽、粤边区的畲族与汉畲民族交融	71
第五节 客家文化形成的脉络	77
第三章 客家文化面面观	84
第一节 客家人的生产生活方式	84
第二节 客家居住文化	90
第三节 客家宗族文化	108
第四节 客家饮食文化	115
第五节 客家服饰文化	122

第六节	客家方言文化·····	131
第七节	客家民间信仰·····	142
第八节	客家风水文化·····	166
第九节	客家民间文艺·····	183
第四章	客家文化特质与客家精神·····	230
第一节	客家文化的多元性结构特征·····	231
第二节	客家文化的移民性特征·····	236
第三节	客家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243
第四节	客家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248
第五节	客家人文特质观照下的客家精神·····	254
第五章	客家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272
第一节	客家文化的特色与价值·····	273
第二节	客家文化的生态保护·····	275
第三节	客家文化与旅游·····	281
第四节	客家文化的产业化·····	285

第一章 河洛文化:客家文化的重要源头

在中华文化的殿堂里,存在着两种亲缘关系紧密而又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即河洛文化和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为什么会与河洛文化发生联系?学者多从移民史的角度进行阐释,认为客家先民大多来自中原,因而在血缘上与中原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文化上也就存在一种自然的移植。这些解释不乏真知灼见,但不能解答关于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即使没有大规模的移民,作为客家大本营的赣、闽、粤边区,依然要与河洛地区发生联系。因此,要考察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最好从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开始。

客家人为什么喜欢依傍中原文化这座大山,甚至不惜泼上浓墨,在珍贵的谱牒家乘中浓重书写自己家族与中原的联系?实际上,这是在寻找一种文化的根。其实,不仅仅客家文化的根在中原,大多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在中原,都与河洛文化有联系。所以,要理清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首先要做的是,弄清楚河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河洛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并主导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河洛地区地处“天下之中”,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又是许多政权的王城之所在,几乎汇集了古代文明发展的所有优越条件。因此,河洛地区自身首先能够生成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优越的生态环境,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因而能够产生巨大的辐射力。加上地处“天下之中”,且有政权的推动,所以,很快地向中原地区推进,继而又推进到周边地区。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成的。

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之间,有着太多的共性。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客家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内核,融中原文化与南方土著文化于一体的多元文化混合体。客家文化为什么会是这样?其实就是中原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以河洛文化发展起来的中原文化,到汉唐间达到最高峰。高度发展的文化,必然要外溢,流向周边,包括赣、闽、粤毗邻区。唐宋时期的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好,经济重心南移也好,其实都是中原文化外溢的表现或结果。当然,为了寻求更多的权力市场,中原地区的中央政府也乐于借助这种文化外溢的张力,推销自己的统治理念。

如果把握了中国文明发展的上述逻辑,通过对文化结构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中原文化烙在客家文化中的强烈印记,也就不难理解:河洛文化其实就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源头。这就是客家文化与河洛文化之间关系的历史逻辑。

第一节 河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是我们最常用且又最复杂的词汇之一。许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力图从历史性、功能性、规范性、结构性等角度对其含义进行界定。现在有关文化的定义多达 200 多种。我们认为,要了解“文化”的含义,首先须从字源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讨。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又有若干引申义。包括美好的言语、思想、行为、待人、处世等表之于外的都称为“文”,它既指文字、文章、文采,又指礼乐制度、法律条文等。如“经纬天地曰文”(《尚书·舜典》疏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文犹美也,善也”(《礼记·乐记》郑玄注)。“化”的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此基础上,“化”又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如《礼记·乐记》:“和故百物化焉”;《荀子·正名》:“状态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文”与“化”的并联使用,最早见之于《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以后,“文”

与“化”方合成一个整词。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在这里,“文化”的含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

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原义是指农耕及对植物的培育。自 15 世纪以后,逐渐引申使用,把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也称之为文化。文化一词的中西两个来源,殊途同归,今人都用来指称人类社会的现象,抑或泛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非物质产品的总和。

今天,我们通常所谓的“文化”,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语言、文学、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文化有几个要素,主要包括:①物质产品。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环境和由人创造出来的一切物品。②精神要素,即精神文化。它主要指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宗教、艺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念等,其中尤以价值观念最为重要,是精神文化的核心。③语言和符号。是人类交往、沟通的工具,亦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④规范体系。约束、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规定,包括风俗、法律和规章。⑤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创造文化的基础。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讲,自从人类出现以后,凡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制度或精神层面的,都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a*)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

把握传统文化之要义,在于理解其传统性。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这种文化必须是既成文化,并且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二是必须世代延续。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很多,但并不是所有文化都能成为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必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够一代接一代不断相传延续的社会历史文化。不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仅暂时存在或短期出现的文化门类不是传统文化。三是这种文化在

传续过程中,还会对当时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

二、河洛地区: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

历史悠久并且流传到现在的中国传统文化很多,但并不是都与河洛地区有关。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方面与河洛地区密切相关呢?我们认为,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河洛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创造了先进的农耕文明。

河洛地区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伊、洛、黄河的冲积平原上,水土资源优越,日照时间长,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因此,在很早的时候,这里的农业就发展起来。华夏族始祖、上古传说中的英雄炎帝创始农耕,教民种植,被尊为神农。“神农作,五谷于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食谷,而天下化之。”^①据《汉语大字典》对“淇”字的解释,“淇山”,即今河南辉县市西北,亦属河洛地区。由此可证,河洛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孕育了农耕文明。此外,从考古发现亦可证明,裴李岗、仰韶、龙山等文化遗址中,农业经济越来越显示其突出的地位。农业生产工具由早期的较为厚重、制作粗糙,到晚期的制作精细,种类繁多,且日趋先进,经历了一个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过程。粮食作物的种类及种植范围,从早期到晚期有所增加和扩大,从而奠定了河洛地区农耕文明的基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河洛地区是我国农耕文化的中心区域,也是农业经济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这里先进的农耕文明不仅为河洛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我国其他地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其中,影响最为久远,适用面最为广阔的乃是与农耕文明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

农业生产是人类最基本和最初的社会活动,历法的发明与其密切相关。农业生产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如果违背农时,就难有收获。为保证农业生产过程中适时而作,人们就要认识和了解大自然,掌握季节变化的规律。河洛地区的先民历经几千年的艰难探索,逐渐掌握时令变化的周期,继而创制出人们共同遵循的历法。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期,河洛地区就出现了天象历法,为历法的雏形,我国古代文献中对此有诸多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

^① 刘向编校:《管子》,《四库全书》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子部三,法家类,卷二十四“轻重戊”。

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①。由此可知,那时的人们便取法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按照节气时令变化安排劳动生产。到了尧舜时期,天象历法应用于农业生产更加普遍。如,帝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②。“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③“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④“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毳。”^⑤“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⑥。这些皆是当时农业历法发展的表现。郑州大河村 5000 余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彩陶天象图,便是对古文献记载的一种印证。从出土的彩陶上发现月亮纹、日晕纹、星座纹和太阳纹,其中,太阳纹更引人注目。每一彩陶中的太阳纹,都由 12 个组成,绘在陶钵腰部的一周,其光芒四射,形象逼真。^⑦河洛地区早期的历法实践,后来经过夏、商等历代填充、完善,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历法,其中比较突出的成就,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完成。后来历代王朝向全国颁布统一的历法中,均以农历二十四节气为基础,用以指导生产或生活,日积月累,已成为传统习俗,直至今今天。

二是起源于河洛地区的炎黄崇拜是维系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文化认同。

炎黄部落原为汾渭平原发展起来的两支部落,在向东扩展的过程中,逐渐进入到河洛地区。大败蚩尤以后,炎黄部落征服了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因此,也逐渐成了整个中原地区共同信奉的神明。

炎黄崇拜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早在上古三代时期,黄帝和炎帝就成为夏商等的祭祀对象:“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故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⑧“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间之,故亡其姓氏。……夫亡者岂

①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页。

②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

③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

④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页。

⑤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页。

⑥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页。

⑦ 参见郑州市博物馆发掘组:《谈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天文图象》,《中原文物》1978年第1期,第44—47页。

⑧ 《国语》卷4《鲁语(上)》,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3—54页。

系无宠,皆黄炎之后也。”^①至春秋战国时期,炎黄崇拜就成为中原地区的共识。据史载:“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②“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③秦汉时期是“黄帝子孙”等称谓出现并得到认同的时期。汉高祖刘邦编造了赤帝(炎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为以汉代秦制造舆论。汉初黄老学盛行,“百家言黄帝”。真正把黄帝华夏始祖之地位确立下来的是司马迁,他持大一统历史观和民族观,将黄帝民族共祖的地位典籍化。在《史记》中,不仅尧、舜、禹、汤、文王、武王这些圣贤明君是黄帝子孙,而且秦、晋、卫、宋、陈、郑、韩、赵、魏、楚、吴、越等诸侯们也是黄帝之后,甚至连匈奴、闽越之类的蛮夷原来亦为黄帝苗裔。如此一来,便把各族统统纳入到以黄帝为始祖的华夏族谱系中去了。后来,“炎黄子孙”就一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族源,对于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的繁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外敌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炎黄子孙”的称谓成为号召与激励海内外华人共同抗战的一面旗帜。即使是在和平建设的今天,“炎黄子孙”这一称谓不仅是一个血缘符号,更是一个文化符号,成为海内外华人对中华文化产生强烈认同的文化基础。

炎黄崇拜的形成,与河洛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炎黄崇拜来源于祖先崇拜,崇拜祖先应始于中原河洛地区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河洛地区的仰韶文化(黄帝部族创造)中晚期其社会氏族的世系已进入父系阶段。在浙川下王岗遗址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地中已出现以198号墓等10余座以男性为主的二次葬墓,并以郑州青台遗址一座夫妻合葬墓证明其时已进入父权家族时代。社会上有父权世系确立,方能言有祖先崇拜。在全国新石器时代,特别是豫周边诸省即陕、晋、冀、鲁、鄂新石器文化比较丰富的遗存中,尚未见比此地有更早的父权家庭确立的证据。所以,河洛地区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便率先进入了父权时代,这是祖先崇拜的前提。

正因为河洛地区有十分浓厚的祭祀祖先的风气,所以夏王朝建立后,最先把黄帝作为国家祭祀。后来继之而起的商周,以及后来的秦汉等中原政权,也紧随

① 《国语》卷3《周语(下)》,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34页。

② 刘安辑撰,张双棣校释:《淮南子》卷19《修务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8页。

③ 《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4页。

夏朝,把炎黄二帝列为国家祭祀。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炎黄崇拜就是在河洛地区发展起来的祭祀文化。

三是中国传统的阴阳思想与河图洛书关系密切。

阴阳思想文化的产生与河图洛书的传说有关。按照传说故事,说忽然从黄河和洛水中冒出了图和书,对于我们今天稍具有科学常识的人来说,肯定谁也不会相信的。但许多古典文献,如《易经·系辞》《论语》《竹书纪年》《礼记》《管子》《太玄》等等,都讲到河图洛书,说明河图洛书即“河出图、洛出书”这个观念在古代一直是相当普遍的。时至今日,河图洛书仍然是个千古之谜。比如,河图洛书究竟是什么?有的说是气象图、方位图;有的说是一种数学公式、数学方程;有的说是祭奠的典礼;有的则把河图洛书跟安徽含山出土的玉帛相联系,并找到考古学上的根据;也有的说,太极图象征着河洛交汇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太极图很像是黄河洛河交汇形成的漩涡,通过这个自然现象触发灵感,伏羲才创造出太极和八卦。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不管学术界观点存在多大分歧,但对于河图洛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认识则是高度一致的:即河图、洛书是古代文化遗产中最古老的智慧结晶,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凝结了古代先哲神秘的想象和超凡的智慧。它包括天文、历法、气象、数理,以及兵、刑、道、法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因此往往称河图洛书为中原地区文化之源和原始文化发展的基础。

众所周知,阴阳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乃至军队实战兵法、民俗风情无不产生重大影响,甚至在科学昌明的今天,阴阳思想依然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心理都有重要的影响。河图、洛书与八卦文化密切相关。《易·系辞上》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核灵赋》曰:“大易之始,河序龙马,洛贡龟书。”把八卦、周易说成是出自天授,伏羲和文王等古代圣贤君王取法乎天,进而形成了流传后世的阴阳学说。

河洛地区与阴阳五行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密切的关系。传说中作为初演八卦的伏羲氏,其活动范围主要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至今,伏羲演练八卦的伏羲台仍然存在于巩义东北部,河洛交汇处以东5公里的黄河岸边上。周文王推演六十四卦的地点也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河图洛书出现的地方,也是在河洛地区。这些都表明,从小的方面讲,阴阳思想产生于河洛之间;从大